

Positive Method and
Value Free in Economics



经济学实证方法与 价值中立原则研究

胡 明◎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本书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增长主义发展模式及其转变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A790047）课题资助

Positive Method and
Value Free in Economics



经济学实证方法与 价值中立原则研究

胡 明◎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实证方法与价值中立原则研究/胡明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096-4533-8

I. ①经… II. ①胡… III. ①经济学—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3442 号

组稿编辑: 郭丽娟

责任编辑: 郭丽娟

责任印制: 黄章平

责任校对: 超凡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1000mm/16

印 张: 15

字 数: 19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6-4533-8

定 价: 5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自序

从本书的标题，读者就可能感知到，本书拟探讨的主题重点涉及经济学的实证方法与价值中立两个问题。当然，这两个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对于前者，自打 J. N. 凯恩斯（1890）定义了实证方法以来，实证方法就一直是经济学方法论的主流。对于后者，自从马克斯·韦伯（1904）阐明了价值中立原则以来，就成了社会科学，当然也包括经济学学术研究的主流。然而，这两个本属已有定论的方法论问题仍旧充满着争议和大量模糊不清之处。

首先，对于经济学的实证方法来说，尽管它是经济学领域最常被提及的关于方法论的称谓，但也是常常造成困扰的方法论称谓。一方面，基本的教科书常常在开篇第一章就会将之解读为与规范方法相对应的方法，这意味着教科书的理论（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学原理）似乎并不需要经验检验；另一方面，学术研究论文中的实证方法则意味着经济理论必须要接受经验的检验。到底哪一种实证方法正确呢？或许有人会说，可以求助于哲学来解决问题，可是关于实证方法哲学界也没有统一的说法。对于实证的含义和本质困扰了几代哲学家，这一术语不存在单一的、大家普遍认可的方法和意义（霍奇逊，2008 年，第 88 页）。当然，在经济学界，人们普遍将实证方法论等同于哲学领域的实证主义，然而，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



代以来，实证主义就代表着一种坏名声（Delanty, 2005; Hands, 1998），而且即使如此，实证方法依然是经济学的主流（汉兹，2009年，第5页）。更有甚者，即使按照哲学的实证主义来理解，经济学内部也无法就其标准本身达成一致（博兰，2000年，第158~163页）。当然，也有人常常将之用来描述（某种程度上带有贬低之意）整个现代经验的社会科学（Delanty, 2005, p. 12），但又没有对这种方法进行严格的说明。因此，经济学的“实证”确实令人困扰。

其次，对于经济学的价值中立原则来说，尽管它是主流经济学学术界所接受的核心学术原则，但仍受到许多不同观点的质疑。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等就质疑这种观点（胡明、方敏，2011年）。如果这种质疑成立，那么存在多种流派的经济学是不是就成了不同的意识形态说教的“战场”？在这种情况下，价值判断是否就是不同流派争议的核心？如果不是，那么所谓的“科学”研究如何能够确保客观性呢？不仅如此，仍然有许多学者，甚至包括许多著名的学者，例如米塞斯，一方面在谈论着价值中立原则，另一方面又倡导着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是否违背了价值中立原则？如何才能保持价值中立？

当然，这些问题都是涉及经济学最基础的问题，因而也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关注得不多。然而，这些问题又是非常难以“简答”的问题，涉及的是经济学的全局性问题，又是任何经济学不可回避的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经济学不能总是仅仅满足于种植“韭菜”之类的东西，它的保鲜期太短，虽然它不可或缺。同样，经济学还应该更多地“种树”，否则的话，我们的经济学虽然收获不少，但多属过眼云烟，能保存下来的太少。

问题摆在那里，总应该有人去尝试着回答。所以，笔者只能是怀揣拙见，勉为其难地给出自己的解读。尽管这种探讨是初步性质的，也未必全

然正确，但笔者相信，即使是错误的答案，也比没有要强，抛砖引玉要比无所事事更有利于经济学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阅读对象应该是笔者的经济学同行，而不是普通大众。

实际上，对于上述问题，笔者（胡明，2014年、2015年；胡明、方敏，2009年、2011年）曾发表过几篇论文进行过初步的探讨。然而，由于期刊发表的字数所限等原因，几篇学术论文实在难以全面地阐述清楚。为此，笔者在已发表的论文的基础上，结合过去未发表的笔记资料和更新的文献，希望通过以一本书的形式使得相关问题的解读更加全面和系统。

当然，一家之言，难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还请学界同行不吝赐教。

胡 明

2016年6月底于北京木樨地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一、本书的主题	1
二、本书对经济学方法论的看法	3
三、本书对经济学范围的看法	7
四、本书的安排	10
第二章 经济学实证方法的演变	12
一、实证经济学的提出	13
（一）穆勒的经济学方法论	17
（二）穆勒传统的后续发展	29
二、实证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39
（一）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40
（二）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及问题	57
三、当前主流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65
第三章 后危机时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证性	76
一、从政策角度穆勒传统捍卫主流经济学	76



(一) 理论推导无法得出政策建议	76
(二) “自由放任”政策无法由经济理论推导得出	83
二、穆勒传统捍卫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89
三、穆勒传统捍卫主流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科学性	93
(一) 核心假设的实在性	94
(二) 基本原理逻辑上的一致性	103
四、穆勒传统消解理论负荷和不充分决定性问题	106
五、穆勒传统在应用经济学领域与主流方法论相融合	109
六、关于弗里德曼方法论的归属问题	113
七、对穆勒传统的总结与评价	117
附录：穆勒传统对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包容	124
 第四章 实证经济学的价值中立原则	130
一、价值中立问题的简要背景	131
二、经济学的认知价值	132
三、经济学的理想类型	134
四、经济学的价值中立	135
五、关于价值中立存在不同理解吗?	142
六、待研究的问题	146
(一) 个人主义是否是经济学方法论唯一的研究视角	
(认知价值)	148
(二) 在手段和目的密不可分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价值	
判断问题	150
(三) 我们能否在相互冲突的价值观中进行价值判断	151
七、未来的研究方向	152



第五章 剖析“价值判断之争”	154
一、“价值判断之争”的爆发	156
二、争论背后的实质	160
三、后续影响	169
四、结论	171
第六章 论实证与规范二分法的“崩溃论”	173
一、最新攻击的剖析	176
二、经济学来自一种贫困的经验论或实证主义吗?	181
三、经济研究的价值能否中立	183
四、经济学能否是一门政策科学	189
五、经济学伦理价值能否进行理性的讨论	195
六、结论	202
结束语	206
参考文献	212
后记	226

第一章 身 言

一、本书的主题

很明显，本书之所以要研究实证方法论和价值中立这两个问题，主要原因在于，这两个问题不仅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也是经济学学者在日常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那么，不仅无法厘清和解决它在经济学领域造成的大量的混乱，而且也无法为经济研究选择合适的方法论提供选择基础，更别说为我们所从事的经济科学（如果它是一门科学的话）进行辩护了。

或许有人认为这些问题经典作家已有清晰的阐述，无须再费笔墨加以研究或厘清。然而，现实中的情况并非如此。例如，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纯理论的抽象建构，它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更没有任何实践价值（布劳格，2000年，第167、169页），可它却为何仍然是大学入门的经济学教科书所介绍的核心基本原理？标准意义上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能解释吗？更有甚者，为什么大多数经济学



者更倾向于较少的政府干预的政策主张？自由放任的政策是否与抽象的一般均衡理论有关？这是否违背了价值中立原则？

对于自由放任政策，19 世纪末期的 J. N. 凯恩斯曾做过厘清，但他也抱怨许多经济学者将纯理论规律与政策戒律混为一谈。到了 20 世纪中叶，熊彼特又抱怨道：人们不负责任地把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过去和现在都超过了同时代分析工具解决的能力。“经济学家们放纵自己爱管政治闲事的强烈癖好，贩卖政治秘方，自命为经济生活中的哲学家，同时却忘记他们有责任把自己引进经济推理中的价值判断交代清楚”。熊彼特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悲叹的事例（熊彼特，1992/1996 年，第一卷，第 38~39 页）。到了 20 世纪末，科兰德（2000）仍在发出同样的抱怨。

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的经济危机时代，主流经济学也明显地受困于其所谓的“实证”方法论：为什么以预测为核心的实证经济学（Friedman, 1953）不能解释和预测危机的生成与发展？这会影响实证经济学的科学性吗？如果将“实证”理解为“用事实来验证”（霍奇逊，2008 年，第 88 页），那么经济危机是否意味着实证经济学的危机呢？如果是，该如何为主流经济学辩护？如果不是，又该如何看待经济学的实证方法？

在中国，类似的疑问也存在。为何基于实证方法的主流经济学无法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给予令人满意的解释？为何中国政府采取的反主流经济政策会取得成功^①（林毅夫，2013 年，第 1095~1108 页）？比如，2014 年 5 月召开的“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就经济学科的基础假定和分析方法的范式转变展开的讨论，同年 7 月召开的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上张维迎与林毅夫“应该回到斯密的观点还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的争议（林毅夫，2014 年）就是例证。上述困惑的存在不仅会影响实证经

^① 林毅夫还认为，发展经济学在发达国家都难以“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发达国家也没有一本实现现代化的“真经”，因此需要新的理论加以解释。



济学的科学地位和发展动向，也关乎其对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发展机理的解释。因此，相关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中国经济学者思考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机理，也有助于进一步探讨经济学未来的某些发展动向。

二、本书对经济学方法论的看法

如果说本书的主题涉及的是经济学方法论，那么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位经济学的方法论。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先谈谈笔者对经济学方法论本身以及它同科学哲学的关系等问题的一些看法，这样不仅能够先期厘清本书探讨的范围，避免过多地涉及与主题多少有些关联的其他问题，而且也能更清晰地回答本书的学科归属问题。

在经济学方法论界，对方法论的理解有两种：一是把涉及具体的经济学方法的研究称为 economic methodology（小写的 em），即日常经济研究中经济学者经常使用的研究技术（McCloskey, 1985, p. 25）。二是把涉及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对象和范围等一般性问题的探讨称为 Economic Methodology（大写的 EM），即经济学的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基本推理原则的研究（Blaug, 1980/1992, p. 1）。目前经济学方法论界及与之相关的杂志包括学科领域的核心期刊《经济学和哲学》、《经济学方法论杂志》主要持后一种立场（即 EM）。EM 主要关注和评价经济理论是否是科学的问题，即用严格的科学方法的标准判定某些经济理论的成功与失败。

很明显，当前主流的经济学方法论强调经济学方法的哲学进路。这一点也体现在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长期影响。从惠威尔（1847）的《归纳

科学的哲学》（第一本专门的科学哲学的著作）到 20 世纪科学哲学的真正诞生，期间孔德的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库恩的历史主义、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费耶阿本德的“反主流霸权”的“一切皆可以”的观点等均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产生过明显的影响。例如最早的系统讨论经济学方法论学科问题的著作是 Blaug（1980/1992）的《经济学方法论》就明显受到波普尔证伪主义的影响。很明显，前述大写的 EM，即经济学的科学哲学，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寻求科学哲学的支持与帮助。

科学哲学所倡导的科学研究的可接受标准，对经常受“经济学是不是一门科学”问题困扰的经济学者常常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例如现代科学哲学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理智论）两个源流，这两个源流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学的发展。例如早在《国富论》时代，斯密就融合了经验主义（归纳法）和理性主义（演绎法）。李嘉图就通过演绎方法尝试着将经济学建成像牛顿物理学一样更加“精确”的科学（索利，1992 年，第 241 页）。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又深受历史主义哲学的影响。萨缪尔森从物理学者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分支）引入了经济学，哈奇森将证伪主义引入经济学，马克鲁普将逻辑实证主义引入经济学，20 世纪 60 年代科学哲学发生的历史学转向推动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济学方法论领域的多元化转向等。这些哲学思潮的引入，推动了经济学方法论领域的进步与争论。

但是也不能高估哲学对经济学的影响，“如果某人真的打算依靠解剖学知识来走路的话，将会有被绊倒的危险。试图把研究宗旨建立在并非本质的方法论考虑之基础上的学者，也有陷入这种困难的危险”（马克斯·韦伯，2009 年，第 10 页）。毕竟经济学不能完全受制于科学哲学，它有它的发展轨迹。也就是说，经济学的创新与革命主要是由经济学家推动

的，而不是依靠科学哲学。穆勒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对经济学适宜的方法进行系统阐述的。门格尔、萨缪尔森、弗里德曼既是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贡献者，更是经济学理论的创造者和贡献者。随着这些不停地钻研科学方法的人对经济哲学问题的不懈探索，他们推动着经济学的发展。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如模型、演绎推理和计量检验等，不仅被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和政治学使用，而且也吸引着不少科学哲学家加入经济哲学的研究行列，从而又反向推动了科学哲学的发展。例如第一个以专业哲学家身份参与元经济学争论的内格尔，就于 1963 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经济理论的危机”一文，讨论了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方法论。另外，波普尔、卡特赖特、豪斯曼等也持续不断地关注并参与经济学方法的讨论。

当然，对于哲学进路的经济学方法论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例如 McCloskey (1985/1998、1994)、Weintraub (1989)、Payson (1996) 等就否定了这种哲学进路的经济学方法论的作用，质疑和批判 EM 的观点。其核心观点是即使是在经济学领域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学者也未必懂得什么经济学方法论原则。在他们看来，哲学家和方法论家都是不能对经济学学科做出什么实质性贡献的外行，许多科学家虽然不怎么了解科学哲学但能继续获得伟大的科学成就就是证明。即使方法论家提出某些要求实践经济学者遵守的方法论规则，这些实践经济学者也可能置之不理。曾对经济学方法有过巨大影响的 Samuelson (1992, p. 240; 转引自韦德·汉兹, 2009 年, 第 1 页) 在其晚年就曾说道：“有科研能力的人，从事科学研究；没有科研能力的人，就闲聊科学方法论。”在这种情况下，大谈什么方法论原则又有什么意义呢？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方法论学者韦德·汉兹也认可这些反对经济学的科学哲学人士的观点。他认为“首字母 M 大写的经济学方法论已然死亡；首字母 m 小写的经济学方法论长生”（韦德·汉兹, 2009 年, 第 8 页）。



然而，尽管经济学方法论或 EM 可能不会对具体的经济问题的研究方法（em）产生直接的影响，但也不能否认 EM 本身对经济学学科的正面影响。“科学哲学对科学的广泛影响激发了所有的科学从业者对科学哲学更有兴趣并参与其中”（Redman, 1991, p. 91）。“一个科学家无疑应该关心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区别，‘好科学’与‘坏科学’之间的区别”（约翰·洛西，1982 年，第 230 页）。

总体而言，科学哲学与经济学最相关的五个问题：①科学的目标是什么？是发现有用的归纳概括还是寻求解释和真理？②什么是科学的解释？用演绎—律则（deductive-nomological）模型还是归纳—统计（inductive-statistical）模型？③如何证实或证伪科学理论？④上述问题的答案在任何时候对所有科学都一样吗？对人类行为和制度的研究能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方法吗？⑤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结构、概念和目标等方面相同吗？自由意志使社会科学不可能成为“科学”的观点正确吗？社会科学是政策科学吗？（Hausman, 2008, p. 5）对于这些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答案，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科学哲学对 EM 的发展有着积极和正面的影响，而 EM 对经济学的学科教育和体系建设同样具有正面影响，虽然未必会对 em 有直接的帮助。

笔者在本书中讨论的主题是分析和比较与“实证”有关的方法论，也就是说，本书讨论的是 Blaug 意义上的 EM。在此笔者无意再深入分析这种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争议，而把目光聚焦于大写的 EM 问题上来回答当今危机时代经济学科的方法论困境问题。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危机时代如何理解经济学的实证方法论，如何重建宏观经济学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来说，只有认真地研究经济学的学科方法论才能给予真正的回答。因而 EM 对经济学科的未来发展仍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

如果本书理解的经济学方法论侧重的是从哲学意义上的经济学哲



学，那么在此我们首先得要从哲学意义上确定本书的出发点。考虑到哲学史上最具基础性的科学源流之一无疑是经验论（另一个是理智论），即使到最近，经验论仍然是构成大多数主流科学哲学的认识论背景（汉兹，2009年，第7页），那么本书所理解的经济学方法论的主题是应用于经济学的科学哲学，主要揭示的是经济学者如何把从自然科学的哲学家那里移植过来的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以回答经济学如何做才能成为一门经验的科学。

三、本书对经济学范围的看法

当然对于经济学方法论本身，不同的流派、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也就自然会有不同的方法论观念。例如，主流经济学通常使用实证方法用以和规范的方法相对。而历史学派、制度学派则强调历史的归纳分析。在此，本书将分析的范围或讨论的起始点局限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不仅为经济学学科独立于其他相邻社会科学提供了依据，而且也是经济学学科的各个子学科统合在经济学名下的基础。因此，研究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其次，本书的主题涉及的是经济学的实证方法，除了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包括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J. M.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使用实证方法外，其他非主流经济学通常并不经常使用所谓的“实证”方法。总体来看，这些流派或多或少对主流范式持批评态度，他们并不完全接受主流经济学关于研究对象、核心解释原则（例如理性经济人假设、理性



选择分析框架、理想类型等),他们更强调跨学科分析,讨论难以量化的制度等问题,而非像主流范式(无论凯恩斯还是新古典)强调经济学作为一门专门化的学科。例如科斯指责新古典是脱离现实的“黑板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研究人的真实心理和行为(也常常以损害新古典的核心假设等面目出现),似乎体现了某些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特征。但又由于这种“直面现象”的实证主义特点,决定了这类理论的形式化程度较低,且跨学科分析色彩浓厚,很难建构起具有完整一致性的理论体系,从而取代主流经济学。科斯呼吁的用“交易成本”重新改造微观经济学的努力就一直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界多少响应。再如马克思认为,“应当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的对立“是唯心主义者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他主张,在研究法律、国家等哲学方面,“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绝不能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11页)。很明显,这种观点完全不同于穆勒传统的实证与规范二分法(或实证主义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当然,不研究并不意味着这些非主流范式就没有研究意义。实际上,他们研究的主题通常是主流经济学忽略的或外生化的因素,因此他们的分析仍可为主流的范式提供有益的补充,特别是他们的跨学科分析对于主流经济学的应用分析能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

再次,此次金融危机以来,主流经济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以下方面:一是意识形态方面。通常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被认为是隐含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金融危机恰恰证明了这种意识形态的破产。针对1929年大萧条后的经济学,哈耶克(1933)曾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就职演说中谈道:“经济学到底怎么了?它为何在那么多非经济学